



毛泽东与中央党校的渊源

毛泽东与中央党校有很深的渊源，1933年5月23日，毛泽东曾给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高级班学员讲中国苏维埃革命史。他生动地讲述了中国苏维埃运动发生发展的过程，并回答了学员提出的“红旗到底能打多久？”“我们为什么不能进行议会斗争和其他合法斗争？”等问题。学员肖锋曾写道：“毛主席讲的课，言简意明，通俗易懂，解答了我们心中不太明白但又迫切想知道的问题，打开了我们困惑的心结，像黑暗中的一盏明灯指明了我们今后战斗的道路。”

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的前身是1931年11月初创立的苏区中央局党校。毛泽东曾给苏区中央局党校的学员们讲过课。苏区中央局党校的源头则是1928年1月至1929年4月间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遂川县城、宁冈茅坪象山庵、茨坪、兴国潋江书院等处开办的党团训练班和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毛泽东不但主办了这些训练班，而且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毛泽东在《古田会议决议》中归纳的10条党内教育的教授法，来自他亲身的教学经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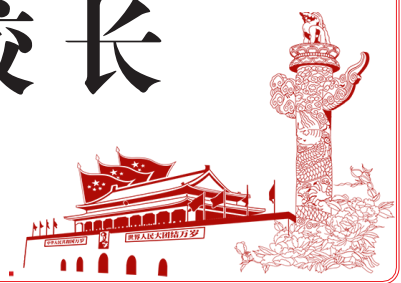
从1935年11月中央党校在陕北复校到延安整风运动之前，毛泽东也经常到中央党校作报告，参加中共中央在党校举办的活动、出席学员的开学或毕业典礼。党校师生无不以见到毛主席、听到毛主席的讲话为荣。1942年3月2日，中共中央决定党校直属中央书记处，其政治指导由毛泽东负责。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决定毛泽东兼任中央党校校长。毛泽东不仅直接领导了中央党校的整风运动，而且具体指导了中央党校各方面的工作。当年中央党校的规模、影响在中国共产党党校发展史上前所未有；其所创造的经验历久弥新，至今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向学员作调查

毛泽东为中央党校制定了“实事求是、不尚空谈”的校训。他在党校的言行，也是实行党的三大作风的典范。学员来到党校就成为毛泽东的调查对象。除了在党校开座谈会，参加

毛泽东：我们的老校长

□ 谢武军



的。‘察言观色’四个字，毛主席赋予了它深刻的含义，我铭刻在心，始终没有忘记。它教我观察问题从个别到普遍，从特殊到一般，从表象入手，进行深入的分析研究，从中找出普遍的本质性的东西；它还教我关心群众，热爱群众，把人民的冷暖甘苦时刻记在心里，当好人民的公仆。”

中央党校四部学员张金保是工人出身的六大代表、六届中央委员。六届四中全会后，因为反对王明的所作所为，被开除党籍。1944年3月，一部学员在讨论党的历史和路线问题时，曾经请张金保介绍过六大的情况。这年秋天，毛泽东亲自到中央党校找张金保了解六届四中全会的情况。毛泽东在党校有一间办公和休息的窑洞，他请教务主任张秀山把张金保找来，和她整整谈了半天。既调查了解了六届四中全会的具体情况，又做了张金保的思想工作。这次谈话张秀山全程陪同，他曾写道：毛主席在

做张金保的工作中也使我受到极大的启发，学习到了毛泽东同志注重调查研究 and 善于做思想工作的作风。

抓党校工作推动全局

整风运动期间，党校每周都要写一份简报将学员学习情况及讨论中有争议难回答的问题向校领导反映，同时送毛泽东阅看。彭真等校、部领导经常向毛泽东和中央政治局口头汇报中央党校的整风情况。毛泽东总是及时给予指示，并用中央党校这个点上的经验推动全党的整风运动。

毛泽东是最善于用报纸来指导工作的。据笔者初步统计，1942至1945年，《解放日报》发表关于中央党校整风学习的信息、报道、学员的学习心得、学习方法和经验介绍等文章39篇左右，充分发挥了党校在整风运动中的示范作用。其中影响较大的，如《解放日报》在1942年5月14日、5月

16日、11月19日刊发的彭真的《领会二十二个文件的精神与实质》《怎样学习二十二个文件》《关于党校讨论大会的方针问题》3篇文章，这些文章发表前都经过毛泽东审阅修改。

按照中央总学委的分工，毛泽东负责抽阅党校系统的学习笔记。他不仅大量阅读党校师生的学习笔记，还将那些有普遍指导意义的学习心得加上批语，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供各地作为整风学习的材料。

中央党校一部学员刘子久在土地革命时期任河南省委书记，抗战时期曾任淮北区党委书记。在党校学习了一段时间之后，他试图按照毛泽东的教导，运用学到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自己在淮北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作理论上的分析。于是就给淮北区党委的负责同志写了一封信，作为到延安中央党校学习心得的汇报。1944年7月5日，毛泽东读到这封信的草稿，觉得很不错。刘子久信中有一句话：“古人说‘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毛泽东在其后加了一句：“我们是最进步阶级和最进步人民的先锋队，我们是共产主义者，应该一变历史上的状况，就是说，在我们党内，在我们的抗日根据地内，是不但有很多的千里马，而且有很多伯乐的，埋没英雄的现象，是不应该有的，一时有这种现象是应该很快消灭的。”不仅如此，毛泽东还指示《解放日报》将刘子久的文章公开发表，新华通讯社向各地广播，并指示各地各级党委，收到文章后，“除在报上发表外，应印成小册，广为散发；同时，连同《前线》剧本一道，均作为各地党校、军校、训练班、整风班及普通中等以上学校的教材之一”。

7月2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刘子久《关于学习问题给淮北区党委的信》。其编者按写道：“刘子久同志在他的信里，代表广大党内党外群众说出了心里想说的话，而他指摘的弊病，作为现象的一种，或一个侧面，在我们党里，在各个抗日根据地里，几乎是普遍存在的。在几年的整风运动中，这些弊病是在逐渐被克服中。但是还没有普遍的完全的被克服。有些地方，有些工作部门，整风还未深入，这些弊病，依然存在，自夸自满、自高自大、官僚主义、脱离群众的风气，并没有很好的受到批判；认真关心群众利益，认真发扬党内外的民主，认真向广大群众中与各个阶层中的模范人物学习，发扬这些模范人物的事迹，当作推动全盘工作的范例，这种作风，还没有完全普及；而要普及它，还须作很大努力。不久以前，我们曾发表苏联作家的剧本《前线》与郭沫若先生的历史论文《甲申三百年祭》，并印成小册，发给同志们阅读，目的都是帮助同志们整风，使我们党内的不良作风早日得到清除，正确作风早日得到普及。现在又将刘子久同志的信发表，并将印成小册广送同志阅读，同样是为着这个目的。”

还有一件事也充分反映了毛泽东善于小中见大、高屋建瓴的政治智慧。1944年1月9日，毛泽东在中央党校观看了师生自编自演的平剧《逼上梁山》，当晚即给编剧和导演杨绍萱、齐燕铭写信，称赞他们的戏是“旧剧革命的划时期的开端”。他深刻地指出：“历史是人民创造的，但在旧戏舞台上（在一切离开人民的旧文学旧艺术上）人民却成了渣滓，由老爷太太少爷小姐们统治着舞台，这种历史的颠倒，现在由你们再颠倒过来，恢复了历史的面目，从此旧剧开了新生面，所以值得庆贺。”毛泽东的信不仅鼓舞了中央党校的戏剧爱好者再接再厉，而且对新中国成立后的戏剧革命乃至促使整个文学艺术界的思想转变发挥了重要作用。直至今今天，这封信所主张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文艺观仍然有其现实意义。



沙石峪随想

□ 孙英臣



沙石峪陈列馆院内的“愚公移山”群雕

乡亲们开始启动“移山”工程。他们以每天挖山不止的愚公移山精神，一层层石板撬起来，一处处夹缝土搜集起来，向荒山开战、向贫瘠开战。层峦叠嶂的九岭十七沟，也曾让一些群众心里犯嘀咕：“凭一根钎、一把镐，东拼西凑、起早贪黑的刨啊、撬啊，啥时才能治理好这石头世界？”但是，大多数群众对改变荒山和贫困的渴望战胜了犹豫和观望，他们也更相信村党支部作出的决定。狗头锤砸瘦了，打秃的钢钎不知有多少根，勤劳的沙石峪人敢教日月换新天，经过90多天奋战，他们削掉两个山头，在山涧里垫起了5000多立方石头，从石缝、崖窝搜来的黄土有1尺多厚，就这样，全村当时最大的一块3亩2分耕地诞生了！1958年，这3亩2分地开始播种，庄稼长出来的时候，乡亲们无不赞叹：“做梦也没想到啊！”当年秋天，这块土地收了800多斤玉米。这块土地被沙石峪百姓命名为“青年地”，而收割的粮食也被乡亲们称为“愚公粮”。

经过持续“造田”，到1963年，沙石峪原来的2.3万多块地合并成6300块，耕地面积从过去的780多亩增加到1200亩。1966年春，张贵顺又带领民兵削掉了沙石峪村北山坡上最难开发的青石板地，并在上面担土造良田，总计行程1万多里、挑土4600多担，垫起2尺多高的土层，造

出了一亩高标准梯田。张贵顺不仅带领全村党员干部群众“凿山铺土”，还带领大家绿化荒山，他们在石板上挖出5700多个一尺见方的石洼，再利用石缝中的土填满，栽上白果树，把光秃秃的“狼洼”变成了绿树满山的“白龙洼”。经过20多年的努力，贫瘠落后的沙石峪从过去只有石头没有耕地的荒山，变成拥有600亩水浇地，林、牧、副业生产齐全的“花果山”、米粮川。

张贵顺和沙石峪人立下愚公移山志，硬是敢在“穷山恶水”前逞英豪，最终让九岭披绿、石板产粮，改变了家乡的贫困面貌，沙石峪的故事是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党领导人民群众艰苦奋斗的见证和缩影。当年，他们战天斗地、移山造田的故事被到处传扬，新华社记者李东生到沙石峪采访之后撰写的长篇通讯《看愚公怎样移山》，发表在1962年6月27日《人民日报》第一版，第一版头条位置还专门配发了社论。1966年和1967年，周恩来先后2次来到沙石峪视察，他赞誉沙石峪人为“当代活愚公”。1971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纪录影片《沙石峪》在全国上映，影片主题歌《当代愚公换新天》响彻神州。那些年，不仅全国各地的干部群众慕名前来沙石峪参观学习，众多外宾也纷纷到这里一探究竟，这里曾经接待过数十位国

家元首及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上万外国友人。当代愚公之乡沙石峪可谓名不虚传、蜚声中外。

从环山路下来，我在沙石峪村走街串巷，踏访张贵顺故居，拜谒张贵顺墓园，在周总理手植树前驻足，进沙石峪陈列馆参观。村里村外随处可见的石板房、石头碾、石头井、大拱桥、梯田，陈列馆中陈列的铁锹、大锤、钢钎、扁担、小推车、柳条帽，都让我触景生情，对沙石峪人改天换地的愚公移山精神肃然起敬。

听当地人讲，现在每天都有外地人到沙石峪来参观，我也遇到不少游客。我想，从四面八方来到这个北方山村的人们，应该内心深处都有追寻这种愚公移山精神的渴望。毛泽东有一段名言：“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在共产党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可以造出来。”正是在共产党领导下，沙石峪人创造了“万里千担一亩田，青石板上创高产”的奇迹。而这种奇迹的背后，则是敢于战天斗地、改天换地的愚公移山精神。2019年，沙石峪陈列馆先后被河北省唐山市命名为党员党性教育基地，被中宣部命名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

如今，在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的新阶段，我们是否还需要“当代活愚公”？是否还需要愚公移山精神？答案不言而喻。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指出，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梦想不会自动成真”，“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广大农村党员干部应当像张贵顺和沙石峪人那样，争做“当代活愚公”，以“万里继续走，千担永远挑”的豪情壮志和愚公移山的奋斗精神，坚决守好“三农”基础，补齐“三农”短板弱项，发掘“三农”潜力后劲，在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奋发有为、建功立业。

“不干以私”于定国

□ 刘琪瑞

于定国，字曼倩，东海乡（今山东鄄城县）人，西汉时期官员。于定国从小跟随父亲研习律法，父亡后，他任过狱史、郡决曹等低阶官职，后因才智出众、办案有方升为侍御史，又升任御史中丞。汉宣帝时，升任光禄大夫，平尚书事，很受重用。于定国谙熟律法和监察事务，在廷尉任上一干就是18年，这既有汉朝皇帝对于定国的信任，更因为他的沉稳持重审慎，治狱决疑有方。朝廷称之曰：“张释之为廷尉，天下无冤民；于定国为廷尉，民自以不冤。”张、于二人是西汉时最优秀的两个廷尉，后世也常常把两人相提并论。因政绩卓著，汉宣帝甘露年间，于定国升任丞相，被封为西平侯，达到了其仕宦生涯的巅峰。

《汉书·于定国传》中，对他的身世以及政绩、政声等，都有记载。尤其对他的父亲于公在任职狱史期间的事情记载得十分翔实，比如“于公高门”“于公治狱”“东海孝妇”“于公祠”等。而对于定国的事迹则语焉不详，最缺乏生动事例。他从郡决曹、廷尉史、御史中丞等一路历练下来，特别是任九卿之一的廷尉18年，必定审判过无数案子，可惜史书中没有留下一件具体的事迹。

倒是同时期与于定国有交往的另一位官员，史书上记载得甚为详细，其中一件“语不及私”的事例，侧面折射出了于定国的廉洁品格。

此人叫尹翁归，也是西汉著名廉吏，做过狱小吏、督邮，后任东海太守及三辅之一的右扶风。《汉书·尹翁归传》是这样记载的：征拜东海太守，过辞廷尉于定国。定国家在东海，欲属托邑子两人，令坐后堂待见。定国与翁归语终日，不敢见其邑子。既去，定国乃谓邑子曰：“此贤将，汝不任事也，又不可干以私。”

结合于、尹二人的其他史料，可从这段记载中，判断出两点“信息”：其一，二人过从甚密。于定国和尹翁归不但出身相似，都曾任过狱

史、狱小吏等类官职，而且意气相投，都为官廉洁勤勉、政绩显著，所以“定国与翁归语终日”。其二，于定国时任廷尉，尹翁归将任东海太守一职，而东海都是于定国的老家，尹翁归去其家乡赴任，临行前到于定国府上拜见辞行在情理之中，有朋友故交的情分在里面。

于定国知悉老朋友要去自己的家乡做官，自然是非常高兴。老家的两个熟人，屡屡嘱咐他关照其子，借此机会，于定国就让两个年轻人坐在后堂等候，方便时出来见个面。结果二人相谈甚欢，皆述公事，畅谈了一天，于定国最终也没有把两个年轻人引荐给尹翁归。送走朋友后，于定国感慨地对两个年轻人说：尹翁归是个贤明能干的太守，凛凛正气啊！你俩在他手下做事，是不能胜任的，我不可以公干私，我看此事就算了！

好个“不可干以私”！这是于定国为官的基本信条。汉代选官选才采用的是察举制与征辟制，赋予了中央和地方官吏一定的荐举权力，而取舍之间，难以确立客观的考量标准。因此，举荐不公、选用不公等情况必然存在。对官居廷尉的于定国来说，举荐些地方上的人任职应为小事易事。要知道，于定国时为九卿之一的廷尉，是朝廷掌管刑狱的最高官吏，可根据诏令逮捕、囚禁和审判有罪的王侯或大臣，可谓位高权重。就是这样一位高官，却不好意思向尹翁归这个好友提出请托之事，更没有以势压人，着实难能可贵。

“不干以私”体现了一个汉代廉吏秉持公心、摒弃私利的端正心态。于定国的境界和操守，值得后世景仰、学习。

